

韩少功

日夜书

知青一代的精神史，
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
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013027510

I247.57
2407

日夜书

韩少功



I247.57
2407



北航

C1635360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夜书/韩少功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21-4804-2

I. ①日…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666 号

出 品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钱 祯

日 夜 书

韩少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232,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04-2/I • 3756 定价: 3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888



李安

韩少功

男，1953年1月出生。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副主编（1982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5年）；《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年）、《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年）、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年）、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年）等职。

已出版“韩少功作品系列”（十卷，上海文艺版，2012年）。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长篇随笔《暗示》，长篇散文《山南水北》。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曾获多种奖项：《西望茅草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过蓝天》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马桥词典》获上海市第四届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等奖（1998年）；《暗示》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2002年）；《山南水北》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2007年）；《马桥词典》获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2010年）；《赶马的老三》获首届萧红文学奖（2011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2002年）。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目 录

01 ... 1	13 ... 89
02 ... 9	14 ... 96
03 ... 17	15 ... 102
04 ... 22	16 ... 110
05 ... 31	17 ... 112
06 ... 38	18 ... 115
07 ... 44	19 ... 121
08 ... 50	20 ... 128
09 ... 57	21 ... 130
10 ... 65	22 ... 136
11 ... 74	23 ... 142
12 ... 85	24 ... 145

25 ... 150

26 ... 172

27 ... 179

28 ... 186

29 ... 194

30 ... 198

31 ... 204

32 ... 210

33 ... 217

34 ... 224

35 ... 228

36 ... 230

37 ... 239

38 ... 244

39 ... 248

40 ... 254

41 ... 259

42 ... 263

43 ... 269

44 ... 291

45 ... 296

46 ... 300

47 ... 308

48 ... 314

49 ... 320

50 ... 328

51 ... 330

作者附注 ... 332

01

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不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落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

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间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画，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扇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地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到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也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

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

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了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蹦蹦蹦蹦，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从此大甲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一路拉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 798 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

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 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 high。只有 high 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 high 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倒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邮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 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则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当成逛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

我醒过来了,再次醒过来了,发现很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得防止自己像一个梦呓者那样把事情说乱。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被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人们晃晃悠悠,找不到轻重,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

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左右,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计划分配。男人每顿五两,女人每顿四两,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食,就只能盼望红薯了。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很多,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